



张斌贤 主编 黄宇红 著

知识演化进程中的 美国大学

在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知识和美国现代大学间的关系是复杂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批评和革命的过程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University in America



京師 高等教育论丛
JINGSHI GAODENG JIAOYU LUNCONG



张斌贤 主编 黄宇红 著

知识演化进程中的 美国大学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UNIVERSITY IN AMERIC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黄宇红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6
(京师高等教育论丛)
ISBN 978-7-303-09210-9

I. 知… II. 黄… III. 高等学校—教育史—研究—美国—19世纪~20世纪 IV. G649.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257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8.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责任编辑: 郭兴举
责任校对: 李 茵

装帧设计: 红十月设计工作室 2008
hengshiyue@vip.sina.com
责任印制: 马鸿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 序

这套“京师高等教育论丛”包括8部有关欧美大学发展的专题研究著作，它们是：

和震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美国大学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李子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变迁与发展》

黄宇红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

王晨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保守主义的大学理想》

杨克瑞博士（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

於荣博士（巢湖学院教育系）的《冷战中的美国大学学术研究》

王璞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文化战争中的美国大学》

周丽华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

这套丛书是我们7年来致力于西方大学史探索的成果之一。它和我们团队在过去7年间先后发表的数十篇论文、二十余篇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已经出版的“大学”书系第一辑《大学：自由、自治与控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第二辑《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以及即将出版的译著《欧洲大学史》(第一、二、三卷) 和“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6 种) 一起, 反映了过去几年间我们在相关研究领域所从事的工作及其结果。

2001 年, 当确定把“西方大学史”作为今后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的主攻方向时, 我们最初的计划是用 5 年左右的时间编写一套 3 卷本的《西方大学通史》。随着学习和研究工作的进行, 我们逐渐认识到, 由于国内原有研究基础的薄弱和史料的严重缺乏, 同时也由于研究对象的异常复杂性(一个突出的例证是, 根据我们的检索, 迄今为止, 欧美学术界还尚未有一部完整的“西方大学史”或“欧美大学史”), 因此, 在开始阶段, 我们只能从专题研究出发, 通过一些年的积累, 才有可能在非常扎实的基础上开展通史的研究。否则, 即使完成一部通史的编写, 也将是非常肤浅的。

2002 年底, 经过深入讨论, 我们重新调整了研究的思路 and 策略, 通过检索文献, 梳理西方大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问题, 确定可能成立的研究专题, 并根据团队成员的专长和兴趣明确分工。从 2003 年以来, 先后确定的研究主题包括: 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知识与大学、大学的理想、大学与社会流动、冷战与大学学术研究、文化战争与美国大学、大学的起源、学术职业的起源与变迁、物理学与大学、大学与财政、越南战争与美国大学, 等等。其中, 关于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知识与大学、大学的理想、大学与社会流动、冷战与大学学术研究、文化战争与美国大学等专题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其他专题的研究也将于近年内陆续完成。

在近年来草就的一些文字中, 我已经就为什么要把“西方大学史”作为一个专门学术研究领域的原因做了说明。简单地讲, 这既是出于学术研究的要求, 更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我认为, 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 大学史的研究具有如此直接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从京师大学堂建立至今, 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近一百多年来, 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但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对大学机构的性质及其角色、功能的片面的、不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有关大学教育发展的宏观或微观决策的失误,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大学性质认识的局限性, 反映了我们对

大学发展逻辑认识的片面性。“如果没有对大学的发展和悠久传统的深入认识，是不可能获得解决大学问题的真正有效的方法的。”^①

在我国大学教育面临新的调整和发展机遇期，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思考和探索大学的本质和大学发展的特征。这是因为，在某种角度上，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机构的基本性质就在于它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之所以说大学是历史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大学是古老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术机构。众所周知，现代大学的共同渊源是以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等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迄今为止，大学已经走过了80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世界现存的各种机构中，除了教会和西欧一些国家的自治城市，很少有像大学那样具有如此悠久和不间断的发展历史。

大学不仅是古老的，同时也是常新的。尽管教会等社会机构的历史比大学更为悠久，但唯有大学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不断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在中世纪，大学依靠教皇、国王所赐予的各项特权而维持自身的生存、扩大自身的影响；到西欧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大学则从桀骜的“国王的大公主”成为“国王的掌中之物”^②。从20世纪开始，由于知识和科学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大学自身不断从知识的仓库成为知识创造的核心，大学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崇高地位，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并且保持着巨大的生命活力。在世界现存的所有机构中，除了大学，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经历了如此曲折而又辉煌的发展过程。

之所以说大学是历史的存在，是因为大学是不断变化的。大学之所以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其根源就在于，在其存在的800多年间，大学始终具有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强大动力。在本质上，现代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调整的历史。尽管在历史上，大学经常是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进

① Ridder-Symoens H De (ed.).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ies in Europe* (Vol. I);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

② 雅克·勒戈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M]. 张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30, 132

行改革和变化的，但就总体而言，大学始终表现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不断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神奇力量。自中世纪以来，从作为学者行会的中世纪大学，到作为精神修道院的古典大学，到“超越象牙塔”之后、承担诸多职能的现代大学，无论从形式到规模，大学的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

之所以说大学是历史的存在，是因为大学的变迁往往是渐进的。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上，并不缺乏急风暴雨般的大学剧变的场景（例如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但历史证明，成功的大学变革却总是那些风平浪静的渐进式改革。埃利奥特在哈佛大学的改革、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改革、博克在哈佛大学推行的核心课程等大学史上常为人称道的经典事例，都是在“风和日丽”下如行云流水般平和地进行的。而这种变革的渐进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学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调节的力量。

众所周知，大学在其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出现之后，就一直处于不同社会势力和力量的作用之下，最初是教会、皇帝、国王和城市的交互影响，之后是政府、市场和科学的相互作用。社会越发展，大学所受到的外在影响越复杂。正是在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变化过程中，大学逐渐形成了应对外在影响和做出反应的复杂机制，大学的机体也由此日益复杂和成熟。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大学对社会影响的反应，但同时也保证了大学有机体的生存。如果大学机构对每一种社会影响都做出整体的剧烈反应，大学或许早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易言之，大学的发展和成熟在于，面对社会的影响，它总是以适合自己价值和使命的特有方式，通过自身非常健全的机制而做出反应的。正因为如此，大学的变化虽然并不总是革命性的，但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对社会环境的巨大适应性。

之所以说大学是历史的存在，还因为大学的本性是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现在，我们似乎都能清楚地理论上表达我们对大学本质、功能、价值、理想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但我们很少清醒地意识到，当我们做出这些表达时，我们所针对的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抽象意义上的大学。无论当我们讨论大学的功能、大学的使命，还是思考大学的理想，以及诸如学术自由、

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等有关大学教育的基本问题时，如果我们的概念框架只存在着一种抽象的大学，必然会无的放矢。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曾广泛地讨论高等教育的职能（或功能）问题，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大事务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区别只在于这三者的相互关系。论者们大多忘记了一点，即这三大职能之间并不是平行的静态关系，而是垂直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发展过程，因此，没有一所大学能同时、同等地承担这三大功能，除非是抽象中存在的大学。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同样的事例也广泛地存在于大学教育改革的政策理论中。而缺乏对大学历史的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也为这种种现象提供了土壤。

张斌贤

2008 年 5 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目 录

CONTENTS

导 言	1
-----	---

第一章 旧学院	8
第一节 “真理统一性”原则	8
第二节 “真理统一性”原则下的学院	15
一、“知识服务于上帝”	16
二、“学以进德”	21
三、“所有的知识都是统一的”	23
第三节 “真理统一性”的范例：道德哲学	28

第二章 新学院	34
第一节 19世纪的新学院	35
一、科学技术教育的全面进入	35
二、“1828年耶鲁报告”	40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	49
第二节 创建大学的尝试	51
一、1825年的哈佛改革	52
二、弗兰西斯·韦兰德和亨利·塔潘的大学思想	54

第三章 新大学	61
第一节 新知识观的胜利	62
一、对培根主义的批判	63
二、新的知识观	66
三、新科学方法的确立	70
第二节 新大学的确立	72
一、新知识观与学院的矛盾	72
二、德国的榜样	76
三、新大学的建立	81
第三节 新大学中的知识与信仰	84
一、自然神学的衰落	84
二、宗教和科学两分法	87
三、知识与信仰的冲突	90
四、知识与信仰的和谐	102
第四节 知识的创造	106
一、知识和大学的相互选择	107
二、研究职能的确立	111
三、研究职能的扩展	117
四、研究生教育	124
第五节 知识的应用	131
一、服务职能的演进	131
二、威斯康星理念	135
三、研究和服务的结合	139
四、私立大学的服务职能	142
五、专业教育	143
六、纯科学和应用科学	149

第六节 知识的平等与选择	153
一、选修制的成功	154
二、选修制的推广	159
三、选修制的影响	162
<hr/>	
第四章 现代大学	166
第一节 知识的专业化	167
一、知识专业化的起始	169
二、知识专业化的深入	180
三、大学与知识专业化	189
第二节 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193
一、“真理统一性”原则的消除	193
二、自然科学的专业化	196
三、社会科学的专业化	202
四、指导性课程的失败	221
五、人文学科的发展	224
第三节 大学组织的复杂化和大学教师的 职业化	234
一、大学组织的复杂化	234
二、大学教师的职业化	244
结 语	261
注 释	270
参考文献	274
后 记	281

导 言

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根本改变，完成了学院向大学的转型，现代大学模式得以确立。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似乎所有的因素都在施展着自己特有的影响，但知识的发展和进步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①如果说没有知识的发展和进步，就没有美国现代大学略有夸张，那么说没有知识的发展和进步，美国现代大学的确立要晚得多，则一点也不为过。但知识和学院向大学转变，现代大学确立之间的具体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书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回答了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知识演变和美国现代大学确立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

一

“知识”的定义和涵盖的范围，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美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世纪70年代以前，“知识”包括所有“正确”的知识、宗教教义、常识性信仰和科学理论，相同的认知标准评价这一切，其中宗教教义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一种知识，因为它赋予知识意义，将抽象的知识变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和解释神的最终旨意的“道德”真理，这种广义的真理观是当时主导的知识观。

19世纪中期，在对达尔文理论以及宗教和科学关系的广泛争论中，美国的科学家和神学家开始尝试重新定义知识和科学，以解决为什么有些形式的宗教与科学相矛盾，而另外

一些则不然。在争论中，新的知识观开始形成。到19世纪末，知识分子意识到知识拥有精神、道德和认知方面，并有意识地切断宗教和知识间的紧密联系，而认为科学是进步的和发展的。因为科学家不断地检验、拒绝或重新定义已接受的观点，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对已有知识的自由质疑，不确定性、因果关系解释、进步和发展成为新知识观的核心。但此时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和教育家虽已将科学与“客观性”联系在一起，但并未将“客观性”定义为“价值中立”，使用“客观性”时仅意味着“经过经验应用的证明”。

到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则完全抛弃了广义的真理观，取而代之的是客观主义科学观，认为“价值”和“事实”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认知真理与经验证明知识相结合，成为衡量知识的标准，在这个标准面前，只有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道德和精神价值不可能是真的，只有在情感的意义，道德和精神的價值才是真的，“真理”不再包括事实知识和道德价值。

本书认为正是这种对广义真理的拒绝和对客观主义科学观的接受，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从学院到大学的转变，实现了美国现代大学的确立。

19世纪上半叶，广义的真理观，本书简称为“真理统一性”原则，制度化美国的学院。学院的模式使抽象的“真理统一性”原则具体化，并加强了该原则的有效性。在学院中，所有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组成了规定性课程，而它们的最高首领则是道德哲学。所有这些知识的目的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知识的规范作用，在于告知学生对家庭、社会、国家和上帝的责任，道德哲学和自然神学成为宗教教义和世俗研究发现之间的最佳桥梁。

19世纪以来的世俗研究所形成的知识，对广义的真理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这种冲击并没有使之发生改变。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在不违背“真理统一性”原则的前提下，在学院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虽多以失败告终，但在学院内部种下了学术和研究的种子，带来了完全不同于旧学院的“新学院”，可以说这是美国大学的酝酿期，正是新学院使美国学院能以相对完整的形态进入大学时代。

到了19世纪末，广义的真理观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知识分子发现学院的规定性课程不能涵盖新的知识和科学，也完全排除所有知识领域的深入研究，对有限的规定性课程阻碍了国家知识和物质进步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了

对广义真理观的怀疑。同时，对进化论的争论削弱了作为宗教和知识间桥梁的自然神学和 19 世纪上半叶广义真理观核心的“培根主义”，因为两者限制了自由追求真理的权利，以不确定性、强调因果关系假设、科学进步为核心的新知识观得以确立。在新知识观的推动下，一些教育家和知识分子开始了改革高等教育的行动，建立了美国大学的最初模式，大学开始摆脱教会的世俗化进程，研究和服务成为大学最重要的职能，选修制原则几乎被所有大学接受。

一开始，这些教育家并没有完全拒绝“真理统一性”的原则，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说明了这点——他们并不希望道德或宗教完全从高等教育中消失，也不希望强调科学价值的中立。但 19 世纪 90 年代专业化的进程打破了他们的这种希望和梦想，知识专业化鼓励了知识的分化而不是综合，到了 20 世纪初，“真理统一性”原则再也不能吸引受过新大学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广义的真理观彻底失败了，“价值”和“事实”完全分离，客观主义科学观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知识的专业化和客观主义价值观的胜利，加剧了大学内部学科的分化和综合，最终形成了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基础上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为了保证知识专业化的顺利进行，大学组织进行了分化，形成了学系——学院——大学的三级组织结构，大学教师也逐步摆脱了对学生和教育的责任，更强调对本学科和专业的忠诚，完成了自身的职业化，自此美国现代大学模式完全建立，并成熟起来。

按照知识和大学的相互作用进程，本书将美国从学院向大学的转变，或者说美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分为三个阶段，新学院——大学的酝酿时期，大致为 1820 年到 1870 年；新大学——大学的建立时期，大致为 1870 年到 1890 年；现代大学——大学的成熟时期，大致为 1890 年到 1930 年，这种分期当然过于简单，在现实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叠。

二

本书的理论基础来自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第一，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认为，知识和科学的发展有社会根源，其进步不是知识在自行轨道

上的自然发展,^① 这种理论意味着大学与知识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为大学与知识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在这种理论中, 大学显然是作为知识发展的背景存在, 本书进一步推进这一概念, 认为知识和大学不再简单是互为背景的关系, 两者是相同的研究文本。

第二, 不同于主要研究思想的发展和特定社会场所、个人或团体利益间的相互关系的传统知识社会学,^② 新知识社会学更侧重考察社会组织如何使知识的整个秩序成为可能的问题,^③ 更倾向于探究社会组织的结构如何产生和支持知识的分类, 并非常关注处于社会和个人之间中等水平的组织, 而大学和学院恰恰正是这样的组织。

第三, 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普遍认为知识和科学的发展必须具备几个因素: 1. 专业团体。专业团体为知识探索和科学研究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公开宣布的场合, 提供了一个对事实加以评论、驳斥和进一步精炼的机会, 专业团体中成员的共同追求和价值, 使知识和科学交流能顺利进行。2. 交流的渠道。在专业团体之后, 交流的重要性凸现, 这是由知识和科学的本性决定的, 知识和科学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 并通过与他人协作表现出来的, 因而知识和科学具有公共性, 每个研究者都为它做出了个人的贡献, 通过评论, 知识被纠正或澄清, 因而交流显得格外重要。3. 知识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 尤其是随着知识的发展, 其所需的经费越来越多。这为解释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知识专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书寻求的是知识和美国大学的历史联系, 探讨的是知识和大学两者的变化曲线, 和变化发生所依赖的思想和制度上的背景, 不是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所以, 本书中“知识”和“大学”的概念, 并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和“大学”现在的正式概念, 而是 1820 年至 1930 年间卷入美国现代大学发展过程中教师和管理者所持有的概念。

“知识”从 19 世纪早期的广义真理观, 到 19 世纪末来自科学探究的结果,

① Kuhn, 1962; Manheim, 1936; Mulkay, 1979

② Manheim, 1936; Weber, 1946

③ Swidler & Ardit, 1994

但并不完全排斥价值的新知识观，到 20 世纪强调知识中立和无价值的客观主义科学观，知识的概念一直是发展的和动态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大学”的概念从最初提供本科教育，到今天包括文理学院、专业学院、提供高于学士学位的计划的研究生院的教育机构，内涵也一直在变化和不断地丰富。

作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和“大学”决定了本书的研究是中观的历史研究，因为大学，既没有涵盖美国高等教育的全部，也没有集中于某所大学，知识的研究集中在参与到大学运动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些知识分子既不是社会的全部知识分子，也不仅仅是精英知识分子，还包括参与到大學运动的普通知识分子。

研究对象也决定了本书的研究是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结合，不是单纯的思想史研究，也不是单纯的制度史研究。因为知识的发展历来不是知识内容的简单积累，而包括人们对知识的看法和认识，即“知识观”，和知识生产、传播、保存等所依赖的组织机构，即“知识组织和制度”。大学运动也同样如此，既有制度上的改变，也有思想上的更新。

思想研究主要是对大学改革者的思想，如亨利·塔潘(Henry Tappan)、吉尔曼(Gilman)、艾略特(Eliot)，以及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包括知名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如化学家克拉克(Clark)，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包括不知名的普通知识分子的言论，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和控制着知识，而且是当时大学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

制度研究主要依据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康奈尔、威斯康星、密执安等美国主要大学进行的。选择这些大学是因为它们在 1820 年到 1930 年美国大学发展中的领导地位，这些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对知识观和知识制度的贡献，以及这些大学类型的全面性。对这些大学的研究，并不是某一大学的校史，而是寻求它们发展的过程中与知识建立联系的共同之处。

三

美国学院向大学的转变，现代大学的确立曾被许多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研究和关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传统派和修正派。传统派比较强调 19 世纪下半叶的革命，认为南北战争前的美国不存在真正的大学，南北战争和 20 世纪间的高等教育转变被认为是现代美国大学发展的分水岭。^① 他们强调现代大学与传统学院的截然不同，认为现代大学的发展是一种革命，并多从高等教育内部研究这种革命。

修正派则对这种革命的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学院的负面，应用更复杂的观点看待学院，并强调 19 世纪上半叶高等教育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强调大学运动的外部因素。^② 修正派的观点公然挑战传统派学院和现代大学的简单二分法，提醒人们高等教育的变革远比“革命”这个概念要复杂得多。但修正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北战争以前这个时段，对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知识演变研究相对较少。

本书采用了修正派的观点，认为在美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批评和革命的过程，用这一观点研究修正派较少涉猎的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这一时段，并从修正派较少研究的角度——知识演变的角度研究大学运动。

以往我国美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虽都提到知识对大学发展的作用，但一般是抽象的和概括的，知识只是作为大学运动的历史背景，而对知识和大学间的具体历史进程鲜有描述，而本书改变了将知识作为大学运动的背景，认为两者不是互为背景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文本关系；并将知识转化为存在于人们头脑，尤其是参与到大学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知识观，和诸如专业团体、

^① Hofstadter & Metzger 1955, Ruldoph 1962, Hofstadter 1963, Veysey 1965, Oleson & Voss 1979, Geiger 1986

^② Louise Stevenson 1986, J. David Hoveler 1981